*本文系 2023—2024 年度辽宁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图书馆‘阅读推广+’学科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LTB202318）研究成果之一。

古籍整理视域下《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时间考辨*

——以 1934 年第四次印本“中华书局版”为底本

徐 凯

摘要：本文系统考证了清初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起始时间，对通用教材和工具书史料中普遍出现的始编于康熙四十年（1701）的说法予以辨证，提出了编纂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史实依据和论证材料，通过未见原始史料、编纂界定不一、引文未著原始出处等原因，既分析了两种起始时间的根由又提出了尚不能确定一说的根据，并简要介绍了该书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为我们日后对该书的深入研究和应用价值提供了参照系，也为学者对转引明清时期编纂的书刊资料须严加考证、比对，对二次文献的普及性知识需要审慎对待并及时查找原文核对，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经典案例。

关键词：古今图书集成　民国文献　古籍整理　编纂时间　起始　陈梦雷

一、《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时间从何时算起？

1.起始时间的差异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类书，对是书的编纂时间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曰“始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1] “初稿始编于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十月开始誊录”[2] “康熙三十九年开始编纂，四十年陆续编出成品，开始雇人抄写”[3]；二曰[4] “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银雇人缮写”[5] “陈梦雷自康熙四十年（1701 年）起潜心编辑一部大类书”[6]。

还有一般工具书介绍常略去时间做概况性叙述，如《辞源》直接介绍书名、作者、卷数称“陈梦雷等原辑未刊行。雍正时，命蒋廷锡等重为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7]但此工具书说法不合史实，按《辞源》的叙述逻辑，定名为《古今图书集成》的人是雍正，但事实上不是雍正而是康熙，“陈梦雷于康熙四十五

年先将誊录的目录、凡例一册呈请诚亲王胤祉裁酌，……此后又经整理，‘越十年进呈，赐名《古今图书集成》’亦即康熙五十五年进呈钦定。”[8]再看雍正做了哪些事情？“（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御制序文附印冠于卷首”[9]，显然雍正是作序而不是定名。《辞源》隶属于二次文献，并未标注原始文献的引用和出处，在史实的认证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其引文和结论的可信度不及原始文献高，这是需要研究者特别注意的。

2.编纂者到底是谁？

与《辞源》类似，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时间问题，《辞海》也是模糊其辞，未指明具体的起止时间，只是做一般性的介绍和叙述，称“陈梦雷等原辑，蒋廷锡等重辑。”[10]但此工具书的说法依然值得商榷，其中“蒋廷锡等重辑”与史实相悖，不甚准确。

王蕾在《清代藏书思想研究》中的说法相对客观，其云：“《古今图书集成》的实际编者为陈梦雷，校订者为蒋廷锡。”[11]可见陈梦雷的著作权是不容抹杀的，而蒋廷锡是作为校订者身份参与的，这也在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中得到了认证：“蒋廷锡接管后的主要工作，比较确切地说，除将已刷过之书通部校阅外，便是厘定、增删、考订和刷印未完的三千余卷及折配装帧事项。其余均未变动。”[12]该文进一步指出：“纵观全书形成的整个经过，不难看出《集成》是在诚亲王胤祉主持下，由陈梦雷一手经营而成的。因此，说《集成》是‘蒋廷锡编辑’或是‘蒋廷锡重辑’是不合史实的。”[13]很显然杨玉良的说法有力地批驳了《辞海》的描述，进一步认证了王蕾将“蒋廷锡”定义为“校订者”的身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于《辞海》《辞源》等二次文献在该书其他史实上的描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对编纂时间只字未提了。

另外，齐秀梅、韩锡铎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蒋廷锡、陈邦彦的工作到雍正三年（1725 年）十二月全部结束。他们只是对陈梦雷已经印刷的 9621 卷重新校对，改其错字，对未印刷的 379 卷重新审核、排字、刷印……他们的工作无法与陈梦雷相比。”[14]走笔至此，才让我们对陈梦雷的著作权有了相对清晰地了解与认定，使我们不至被一些概论性教材和工具书所误导。

二、《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时间差异因何而起？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的起始时间，有两种不同

说法，即康熙三十九（1739 年）、康熙四十年（1740 年）。依笔者来看，有以下三种原因：

1.因原始资料不易查见

根据我们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明确提到该书编纂时间的文献并不多，而《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版也并未在网络上流传，故无缘从第一手资料中核查到刊刻文献中是否明确提到这一时间节点。但从流传下来的作者的一些文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旁证，来辅助我们进行一些判断、寻找一些线索。如编纂者的陈梦雷有诗文集《松鹤山房文集》，其中就明确记载有关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时间问题，该文集描述为："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银雇人缮写。"[15]

据此可知，在陈梦雷的自述中，"康熙四十年十月"是《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的一个明确的起点，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文中提到的"领银雇人缮写"，至于缮写之前的搜集、整理工作，算不算"钦定图书"的正式编纂，还需要对"编""纂"和清代刻书制度和官方认定标准做进一步探讨。

2. 对"编纂"含义的界定有所不同

如《清代藏书思想研究》中采用的"始编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说法，与"康熙四十年（1701）领银缮写"就存在对"编纂"一词的明确界定与编写起点的历史真实。从字面来看，"始编"就是"开始编写"的意思，编写可能有草稿和正式刊刻之分，而草创阶段也有一个构思、分类、搜集、整理等过程，那么"编"这一行为的起始点是否只意味着"写"这一含义吗？还是酝酿、钩沉文献的过程，这些在脑海中酝酿的思维活动也隶属于"编"的范畴呢？《辞海》第一一七页"编辑"词条解释如下："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为目的，策划、组织、审读、选择和加工作品的专业性精神生产工作。"

两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精神生产工作"、一个是"策划、组织、审读、选择"。像杜泽逊所说从康熙四十年开始，很可能是从"官方拨款""签字发文件"的角度来说，而并非是对开始"编辑"的准确认定，因为编辑工作的起始是从"策划"开始的，相当于今天的开题报告或者是申报书阶段就已经纳入到"编"的行列和计划中了，而不一定非要等到"立项成功""公示拨款"这个时间节点，因此"始编于康熙三十九年"是有一定的逻辑依据和史料依据的，就像齐秀梅论文中描述的那样，康熙四十年已经有成品陆续编出，十月份时已经开始

正式找人而且是官方拨款进行“精写精刻”了，古人刻书刊行之前是要经历草创和找人缮写两个阶段的，就像《红楼梦》现存最早的版本甲戌本的祖本刊刻年代据专家考证是在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也就是 1754 年。但那是出版发行的时间，不能说是曹雪芹开始创作的时间，更不能说是脂砚斋“开始编纂”的时间。

所以，我们由此可说，文献学概要中的“康熙四十年十月到四十五年四月修成”和《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中的“自康熙四十年始编辑一部大类书”的说法容易混淆这部大型文献的编辑时间乃至磨灭、抹杀陈梦雷在官方“缮写”前的策划、搜集、整理、筛选、手写等一系列工作，也从版刻史和纂修史的角度割裂了类书的创制过程，不利于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对于编制细节和编纂思想的探讨。

3.编纂起始时间尚不能定论

尽管我们已经梳理了一些现有材料，对陈梦雷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开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这一事实“证据确凿”，但我们并不是根据原始档案和刊刻原文进行比对得出的，而且通过转引材料进行间接论证。也就是说比如《亘古盛举》中提到的“对于康熙三十九年开始编纂，四十年陆续编出成品”之说，以及王蕾在《清代藏书思想研究》中提出的康熙三十九年“始编”之说，都没有表明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始出处”，所以，我们当下只能将这一问题暂做存疑或推论处理，待学者可以拿到清代档案或《古今图书集成》原始文献或影印本进行仔细查阅和比对，再做进一步分析、确认。但并不排除刊刻的原书也没有准确写明或界定编辑的初始时间，或与我们现有掌握的材料如出一辙，那么就需要我们抛开直接证据、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和方法强化目前的推论，相信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与科学的方法手段，可以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并在编辑时间确认的基础上对这部类书的思想、文化、流传、影响有更为细致、全面的探索与揭示。

最后，让我们简单了解下这部清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

三、《古今图书集成》的文献价值

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介绍：“古今图书集成……清康熙年间始编，原为陈梦雷所纂，名《古今图书汇编》，历十余年书成，由康熙帝审阅，改今名。本拟交武英殿校正印行，但因雍正初陈梦雷获罪戍边，别命蒋廷锡等校勘重编，三年告竣。……此书资料宏富，条理清晰，体例上亦多首创，深得国际学者重视，

誉之为中国古代大百科全书。……最早是雍正四年（1726 年）开始用陈梦雷原来计划的铜活字印刷，雍正六年（1728 年）印了 60 部，分订 5000 册，分装 523 函，另编目录 20 册，分装 2 函。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均藏全帙，其书半页 9 行，行 20 字，白口，四周双边。”[16]

由此可知，一、该类书在分类上多有创见，全书共分 32 典、6109 部，其中汇考、总论、图表、例句等详细、精当；二、其采用铜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刻书史上享有盛誉，是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三、中国第一大类书明代的《永乐大典》十不存一，次之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成为了现存最大的类书，其富赡翔实、图文并举、查检科学的内容和体例让其享誉海内外，据研究者揭示“英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大量引用《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图。”[17]可见，《古今图书集成》在中外学术史和文献史上的地位。

该书还专门设有“艺文”类，包括大量的诗词文赋，选取的原则乃是“议论虽偏而词藻可采者，均录入……隋唐以前从详、宋以后的从略。篇幅多的择其精要，篇幅少的则瑕瑜不弃。”[18]真无愧于“类书之最”的美誉和称号。相比于后来“寓禁于征”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销毁撤改，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1]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3.
[2] 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01):32-35.
[3] 齐秀梅，韩锡铎.亘古盛举:《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31.
[4]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7.
[5] 张新民.《古今图书集成》之特征及其编者[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6(11):125-128.
[6] 曹红军.《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03):53-66+157.
[7]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06.
[8] 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01):32-35.
[9] 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01):32-35.
[10]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418.
[11] 王蕾.清代藏书思想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3.
[12] 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01):32-35.
[13] 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01):32-35.
[14] 齐秀梅，韩锡铎.亘古盛举:《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33.
[15] 崔文印.说《古今图书集成》及其编者[J].史学史研究,1998(02):61-68.
[16]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济南：齐鲁书社，1996:130.
[17] 齐秀梅，韩锡铎.亘古盛举:《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41.
18 百度百

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4%BB%8A%E5%9B%BE%E4%B9%A6%E9%9B%86%E6%88%90/795364?fr=aladdin[EB/QL].[2022-12-8].
本文作者：徐凯，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中级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小说，阅读推广。通信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850 号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13478607633　著有《阅读推广+：理论与实务》（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 3 月版。）